

共同富裕的中国之路:政府采购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李增福 雷艳

(华南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是实现共同富裕、提升民众幸福感的重要路径。劳动收入份额的形成不仅由企业内部的利润分配决策和要素市场结构所决定,还受宏观制度环境的深刻影响。从生产要素报酬分配的理论角度出发,资本跟劳动收入的划分除受技术进步和资本替代程度的影响之外,同样受到企业融资条件、经营稳定性以及人力资本投入程度的束缚。在这个特定背景之下,政府采购作为关键的财政支出手段,可能通过改进企业外部环境、增强经营预期、引导用工结构变动,由此改变企业劳动收入分配的格局。基于此,本文选取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系统分析了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逻辑。研究发现,政府采购可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检验表明,政府采购主要借助三条途径发挥功效:一是缓解融资困境,以“信用标签”形式存在的政府采购合同能提升企业商业信用;二是维持经营的持续性,稳定的政府采购需求可降低业绩产生波动的风险;三是推动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采购项目的高要求推动企业加大技能型劳动力的投入。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经济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地区、内部控制强度弱或ESG评级较低的企业,政府采购的正向效果更为显著。研究拓展了政府采购微观经济后果的研究边界,揭示了政府采购带动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和优化内部收入分配的新机制,为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经验依据与政策方向。应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制度设计,加大“靶向支持”力度,引导企业修整薪酬分配体系,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的协调并行。

关键词:政府采购;劳动收入分配;融资困境;经营稳定;人力资本结构

中图分类号:F812; 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5)06-0080-16

DOI:10.19742/j.cnki.50-1164/C.250608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提高居民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一论断为解决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提供了明确思路,即通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来调节社会财富分配格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明确要求“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提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等具体要求。作为国民收入分配的核心部分,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占比对于优化收入分配机制、达到共同繁荣和推动经济的高品质增长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异以及阶层间差距,不断加大对劳动收入的投入力度。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劳动收入所占的比例持续下滑,并长时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1]。这不仅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均等,更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和经济高质

收稿日期:2025-11-23

作者简介:李增福(1968-)男,会计学专业博士,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公司金融和公司财务。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会计信息畅通供应链合作创新机制与路径研究”(23BGL102)。

量发展。在此背景下,各级政府如何发挥“有为之手”,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地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是当下亟待破解的关键问题之一。

前期文献研究中,共同富裕议题已然受到广泛关注^{[2]-[4]}。值得注意的现象在于,劳动收入的主要提供者为企业实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关键亦在于此。连接公共需求与市场供给的重要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采购,“需求侧”特征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理应成为该政策功能的本质要求。现有关于政府采购的研究范畴主要集中于技术创新性、生产效能指标及就业效应等领域^{[5]-[6]},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系统性探讨尚显不足。提高企业劳动收入占比是达成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也是革新收入分配方式、增强劳动者幸福感的关键要点。从微观层面讲,它体现出企业产出分配向劳动要素的倾斜水平;就宏观层面而言,其变动关乎收入格局的优化和社会的稳定局面,政府采购借助市场准入和合同执行,给企业传达稳定、长期、可预期的需求信号。基于不完全竞争理论和合同理论,政府采购合同体现出履约的确定性与信用背书效应,好比隐性担保,能缓解信息不对称现象与融资限制,驱动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基于效率工资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由于政府采购的高标准要求,企业开始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招入高技能劳动力。从风险分担和收入平滑理论方面看,政府采购产生的稳定现金流可减少业绩的波动,增进劳动者收入的稳定程度和议价实力,最终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研究政府采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仅充实相关领域的研究范畴,也具有关键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通过将 2015 至 2022 年间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开订单合同数据作为样本期,并匹配全国范围采购合同与上市公司母子公司数据。研究证实了政府采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作用。融资压力缓解程度、经营稳定性保障水平以及人力资源配置优化状况等维度构成了主要作用机制。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内控机制薄弱企业以及 ESG 评级较低样本中,政府采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果更为突出的结论在异质性分析中得以验证。

本文的贡献聚焦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把研究视角提高到“十五五”时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高度,增强了对政府采购微观经济影响的把握。现存文献虽围绕社会责任、技术创新、就业水平等角度展开分析,并涉及劳动收入份额^{[7]-[9]},但未置于核心研究视野。本文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为切入点,系统评估政府采购效能并在新发展阶段的功能定位方面填补理论空白,进而提供了前瞻性的观察视角。其次,察觉到政府采购作为需求侧政策在调节初次分配中的关键作用,为“十五五”期间优化宏观治理途径提供了实证支持。本文不仅揭露了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更说明其具体的作用途径,这一发现明显提高了对政府采购政策的把握水平,令其跳出传统的经济刺激功能范畴,彰显其作为促进社会公平的可靠政策杠杆的价值,为未来五年改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收入分配政策体系提供学术支撑。最后,剖析了政府采购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本文不仅在认识经济增长及劳工权益等事项上具有理论意义,更关键的是为政府“十五五”期间优化采购体系、把公平目标纳入宏观经济管理流程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践引导,有利于推动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模式。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文献回顾

1. 政府采购

作为针对企业需求端的财政政策手段,自政府采购法颁布的那时起,政府采购的规模不断扩大,对经济发展和企业行为形成广泛影响,政府采购借助直接需求推动企业壮大,推动生产规模拓展,同时带动技术提升^[10],增加雇佣人员。不同于直接补贴或税收优惠,政府采购还能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改善 ESG 表现。美国等一众西方国家普遍采用此工具,推动企业达成高品质发展^[11]。与私人客户相比,政府客户稳定性较高,订单信息透明化,有效控制产能的风险水平。政府客户执行治理职能^[12],增强不同利益群体彼此间的信任与资源的共享,助力企业获得外部商业信誉方面支持。政府客户的财务状况通常较好,企业倾向于进行长期合作,以降低失去大客户风险^[13]。政府采购合同搭建稳定的市场渠道,

降低企业面临的风险情况^[14],增加生产效率及经济效益,中标企业凭借政府采购得到资金支持和市场机会,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在经济危机出现期间,与政府建立稳定合作的企业,其市值和投资能力皆强过同类企业^[15],体现出政府采购在支撑企业长期发展方面具有的独特价值。

2.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收入份额是衡量劳动者收益在国民收入分配里占比的关键指标,它不仅体现出劳动者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地位,还跟经济增长、社会公平以及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联。党中央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问题给予高度重视,这也促进学界去开展深入研究,伴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居民消费率持续上扬,但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比重却逐步降低,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使其成为经济领域急需攻克的核心议题。

目前的研究主要围绕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探讨,学者们通常关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法律制度完善等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何小钢等研究揭示,机器人应用一般会引起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16],但从长远角度看,伴随生产率的增长,其可能带来更正面的结构性效果。技术应用最终会改善劳动者的就业机会,进而提升其收益所占比例,产业升级也会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17],优化了人力资本结构,利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完善的法律制度可有效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而稳固劳动者在收入分配里的地位^[18],企业内部治理、风险管理加上员工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份额同样起到重要作用。企业面临的风险大小与劳动收入占比呈正相关,在风险比较高的企业里,劳动者的收入占比一般是更高的^[19]。

总体来看,现有的研究在宏观与微观因素上均有了进展,但从财政政策方面视角,尤其是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依然缺少系统研讨,而企业是否中标也许会对其经营决策及风险管理造成深刻影响。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针对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数量较少,现有成果多从收入分配、企业行为以及工资结构等层面进行研究,作为需求侧范畴的财政政策工具,政府采购跟直接补助等行政化资源配置方式不一样,其主体凭借强大的购买水平和较高的偿债本事,可以有效延展企业销售市场,由此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15]。就企业这个层面而言,劳动收入份额一般采用劳动报酬与总收入或总产出的比值来计量,由企业为劳动者支付的报酬、产值水平高低和营业收入情况而定,企业发展层次越高、劳动者能力越高,劳动收入所占份额越大,提高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途径关键在于推动企业发展和提升劳动者本领,结合政府采购的作用原理与客户属性,可认定其拥有推动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升高的潜力,政府采购可能经由多重途径推动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加,接下来针对具体机制进行分析。

1. 改善企业经营困境

中标企业能够缓解融资困境,从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企业长期受融资难制约,其中信息不对称是主要原因。市场信息不完全使金融机构难以判断企业未来经营状况,外部投资者难以信任企业,从而导致企业在获取资金时面临现金短缺。政府采购为企业提供了缓解融资约束的新途径。一方面,中标合同向投资者传递企业产品质量和技术优势的积极信号^[20],吸引外部资金流入,增强商业信用和融资能力。由于政府采购具有选择性和竞争性,中标企业等于获得“高质量标签”,向消费者和投资者传递正面信息。另一方面,政府采购使资金流与预期应收账款,同步提高企业现金流现值,减少融资成本,改善融资困境。中标企业还可利用未来现金流作担保^[21],通过借款解决融资问题。过往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2]。汪伟等人则指出,融资约束是劳动收入份额长期缓慢下降的重要缘由之一^[23]。企业采用债券融资手段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后,可大幅提升劳动收入份额^[24],由此可见,政府采购凭借缓解融资约束优化企业发展的环境,进而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

2. 稳定企业生产经营

政府采购可以稳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扩大生产规模,继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可从两方面对这种作用进行分析:一是直接把生产规模扩大,二是降低业绩起伏的风险。首先,政府采购主体具有较高

的购买力,为企业产品拓展广阔市场,利于将生产规模快速扩大^[25]。借助集中采购模式跟庞大市场,中标企业可搭建新的销售渠道^[26],又因为采购流程开展公开竞争,中标产品一般都具备较高的市场信誉及品质保障,导向市场消费的偏好走向。生产规模的扩大也可直接推动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倪晓然等人的研究表明,生产规模变小会引起劳动收入份额下滑^[27];规模扩充一般会伴随着劳动力需求的增大,劳动收入份额由此实现提高。除此之外,企业 ESG 表现也会引发生产规模扩大效应^[28],主要凭借促进就业增加劳动收入份额。其次,作为相对稳定的采购一方,政府订单可以缓解市场不确定性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过大阶段,可充当“稳定器”发挥功能,维持业绩的平稳,政府采购客户缺乏那种强烈的利润最大化动机,对机会主义行为的管控力度弱,让交易风险下降^[29]。进一步分析发现,当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呈上升趋势时,往往会降低其对劳动力的吸引力,进而拉高劳动力成本^[30],抑制劳动雇佣规模扩大。当经营风险开始下降之际,企业对劳动力的吸引能力变强,劳动成本相对削减,劳动雇佣的潜力开始释放,劳动雇佣的增多表明劳动在企业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会相应上升,由此推动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3. 优化人力资本结构

政府采购可推动企业开展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行动,加大高素质人员的占比,由此提升企业劳动收入比重。一方面,政府采购对企业产品及服务有较高的要求和标准,中标企业由此得符合更高的质量要求,促使其提升对高技能劳动与高素质人员的需求,进而助力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与改进^[31]。另一方面,随着政府采购订单的稳定性不断增强,企业更愿意采用长期培养的模式,诸如资助员工接受继续教育,规定其完成学业后回到企业任职等,由此促使企业内部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与发展。政府采购不仅带动了企业的经济收益,还依靠稳定订单与较低的违约风险强化了企业吸引力,让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优质的劳动力资源。进一步分析,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体现为企业更多依赖高技能劳动与高素质员工,而劳动报酬在企业成本及分配里的占比一般会随之提升。由于高技能劳动呈现出较高的边际产出,当企业招聘更多高技能员工的时候,企业平均回报率要高于对高技能员工依赖程度较低的企业,劳动要素边际收益会挤占掉资本边际收益,推动资源分配朝劳动要素倾斜,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32];企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会增强生产率与竞争力,进而扩大了整体的收入规模,为提高员工工资提供了空间^[33]。因此,政府采购以推动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为途径,能够推动劳动报酬在企业分配体系中的相对提高。综合以上分析,设定了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政府采购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内劳动收入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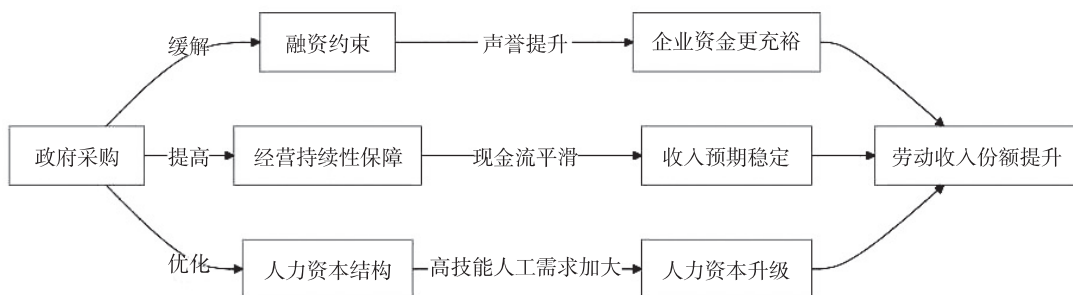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分析路径图

二、研究设计

(一) 选取样本与数据获取

基于2015年《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生效后,政府采购网显著增强了公开合同信息的透明度与详细程度这一背景,本文选取2015年至2022年作为主要的研究范畴。具体做法是:首先,通过爬虫技术收集该时段的政府采购合同数据;随后,基于采购主体等关键指标进行了上市公司的对应性匹配分析。

考虑到大量订单由子公司获取,借鉴孙薇和叶初升的做法^[8],在母、子公司层面分别匹配并去重后,以自然年为基准汇总至母公司层面,得到“上市公司—政府采购订单”数据集,最终获得 24 186 个企业年度观察值。本文据此构建回归模型并采用 OLS 估计,同时对连续变量在 1%和 99%分位点缩尾处理,以减弱极端值干扰。

(二)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借鉴施新政等、于小悦等的研究^[1,9],本文构建了以下模型:

$$LS_{i,t} = \alpha_0 + \alpha_1 CG1/CG2_{i,t} + \alpha_j \sum Controls_{i,t} + \lambda_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LS_{i,t}$ 为劳动收入份额; $CG1/CG2_{i,t}$ 为本文的解释变量; $Controls$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λ_t, μ_i 分别表示年份固定效应和企业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则是随机扰动项。

1. 被解释变量

借鉴白重恩等的研究方法^[34],本文采用要素成本法的增加值理论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估算。具体地,该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定义为: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总额,除以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后的余额,再进一步加上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总额与固定资产折旧总额的合计值。

2. 解释变量

在既有文献中,企业层面的政府采购研究常见做法之一是基于“中国政府采购网”披露的合同信息,通过爬取采购人、供应商、采购金额及合同年份等数据开展实证分析。相比第三方调查数据和上市公司客户数据,这一方式在样本覆盖和信息完整性上更具优势。因此,本文同样采用政府采购网披露的合同数据,并据此构建核心解释变量:其一, $CG1$ 表示企业在某年度是否成功中标政府采购(中标赋值为 1,否则为 0);其二, $CG2$ 衡量企业在某年度的政府采购规模,以采购金额加 1 后取自然对数处理。

3. 控制变量

结合本文的实际研究内容,参考王雄元和黄玉菁、姜爱华和费堃桀、方军雄等的研究在企业—地区层面上选取控制变量^{[35]-[37]},具体的变量定义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表

类型	名称	定义
被解释变量	LS	劳动收入份额,以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总额,除以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后的余额,再进一步加上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总额与固定资产折旧总额的合计值表示
解释变量	$CG1$	是否获得政府采购,以企业当年是否获得政府采购订单表示,获取订单为 1、没有获取为 0
	$CG2$	政府采购规模,以企业当年获得政府采购订单总金额加 1 后的自然对数表示
	$size$	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LEV	企业总负债除以总资产
	Age	企业年龄
	ROA	总资产净利润率
	$cash$	现金比率
	$Growth$	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
控制变量	$Indep$	独立董事除以董事人数
	$DUAL$	若企业总经理和董事长由一人担任,取值为 1,否则为 0
	TOP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股本总数
	TBQ	托宾 Q 值
	$Board$	董事会人数取自然对数
	SOE	产权性质,国有企业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GDP	企业注册地所在省份 GDP(千元/人)的自然对数

三、实证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2 为本研究的描述性分析,其中的主要变量 *LS* 的均值为 0.320 5,中位数为 0.305 6,这表明我国大部分的上市公司将超过 30%的营业收入用于支付员工工资。但表中变量 *LS* 的最大值为 0.823 7,与最小值为 0.065 2 差异悬殊,这表明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有很大的差异。此外,其余控制变量与既有研究相似,未见显著差异。

表 2 描述性统计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LS</i>	24 186	0.320 5	0.140 5	0.065 2	0.823 7
<i>CG1</i>	24 186	0.205 9	0.404 4	0	1
<i>CG2</i>	24 186	1.421 1	3.044 8	0	13.253 4
<i>size</i>	24 186	22.305 2	1.313 3	19.996 3	26.395 1
<i>LEV</i>	24 186	0.412 6	0.200 9	0.059 4	0.894 7
<i>Age</i>	24 186	2.068	0.965 8	0	3.367 3
<i>ROA</i>	24 186	0.037 4	0.068	-0.298 9	0.201 3
<i>cash</i>	24 186	0.807 2	1.152 2	0.024 7	7.177 5
<i>Growth</i>	24 186	0.353 1	0.861	-0.708	5.906 8
<i>Indep</i>	24 186	37.774 3	5.367 7	33.33	57.14
<i>DUAL</i>	24 186	0.309 1	0.462 1	0	1
<i>TOP</i>	24 186	33.628 8	14.644 4	8.48	74.24
<i>TBQ</i>	24 186	2.084 2	1.381	0.834	8.912 1
<i>Board</i>	24 186	2.225	0.173 6	1.791 8	2.708 1
<i>SOE</i>	24 186	0.313 7	0.464	0	1
<i>GDP</i>	24 186	11.354 8	0.409 3	10.440 6	12.122 6

(二) 基准回归

为检验政府采购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关系,表 3 报告了模型(1)的实证回归结果,第(1)~(2)列是未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第(3)~(4)列引入了控制变量及企业层面的年度固定效应,结果表明,政府采购 *CG1* 与 *CG2* 的系数均保持正值,这证实了研究假设的有效性。

表 3 基准回归

变量	(1)	(2)	(3)	(4)
<i>CG1</i>	0.004 4* (1.885 1)		0.006 0*** (3.041 1)	
<i>CG2</i>		0.000 9*** (2.649 0)		0.001 1*** (4.023 3)
<i>size</i>			-0.029 2***	-0.029 4***

续表3

变量	(1)	(2)	(3)	(4)
			(-6.807 4)	(-6.829 9)
<i>LEV</i>			-0.003 1	-0.002 9
			(-0.231 7)	(-0.217 1)
<i>Age</i>			0.018 5***	0.018 5***
			(6.630 8)	(6.655 7)
<i>ROA</i>			-0.736 5***	-0.736 4***
			(-29.571 6)	(-29.570 9)
<i>cash</i>			-0.000 7	-0.000 7
			(-0.659 8)	(-0.645 7)
<i>Growth</i>			-0.001 8	-0.001 8
			(-1.634 2)	(-1.638 3)
<i>Indep</i>			-0.000 2	-0.000 2
			(-0.666 9)	(-0.653 9)
<i>DUAL</i>			0.004 3*	0.004 3*
			(1.652 7)	(1.673 3)
<i>TOP</i>			0.000 3	0.000 3
			(1.594 4)	(1.595 0)
<i>TBQ</i>			-0.002 9***	-0.002 8***
			(-3.276 4)	(-3.239 8)
<i>Board</i>			0.002 9	0.003 0
			(0.259 8)	(0.269 3)
<i>SOE</i>			0.025 1***	0.025 0***
			(4.068 0)	(4.035 7)
<i>GDP</i>			0.021 6*	0.021 7*
			(1.787 7)	(1.796 1)
<i>Constant</i>	0.319 8***	0.319 4***	0.704 1***	0.705 0***
	(654.759 9)	(666.342 8)	(4.244 7)	(4.247 8)
企业/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i>N</i>	23 628	23 628	23 628	23 628
调整 <i>R</i> ²	0.652 9	0.653 0	0.742 7	0.742 8

注：*、**、***分别代表在10%、5%、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对应于*t*统计量，下表相同。

(三) 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处理

由于反向因果关系可能导致内生性,因而基准回归结果可能存在偏差。一方面,政府采购会影响企业收入,从而改变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企业收入增加也可能提升其支付劳动收入的能力,进而提高市场地位并获得更多采购合同。为得出准确结果,需在计量框架内同时考虑政府采购与营业收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加以处理。尽管基准回归已控制企业和年份效应,但仍可能遗漏重要影响因素,为检验潜在问题,本文进一步引入交叉固定效应。第一,工具变量法。本文以企业每年获得

的政府采购订单数量占总采购订单的比例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进行回归分析。表4前两列的结果显示,政府采购(*CG1*为虚拟变量,*CG2*表示政府采购规模)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均显著为正,这表明政府采购对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占比有扩大的作用,从而验证了研究假设。第二,交叉固定效应。在基准回归已控制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引入行业—年份和城市—年份的交叉固定效应。表4结果表明,无论在何种固定效应设定下,政府采购变量*CG1*和*CG2*的回归系数均证实政府采购提高了劳动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这与前文结论一致。

表4 工具变量和交叉固定效应

变量	(1)	(2)	(3)	(4)	(5)	(6)
	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	行业年份	行业年份	城市年份	城市年份
<i>CG1</i>	0.032 2*** (4.416 2)		0.004 3** (2.232 9)		0.005 0** (2.463 9)	
<i>CG2</i>		0.003 9*** (4.421 5)		0.000 8*** (3.007 2)		0.000 8*** (2.823 7)
控制变量/企业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i>LM</i>	194 0.323 066 3	238 9.451 356 2				
<i>LM-P</i>	0.000 000 0	0.000 000 0				
<i>N</i>	24 221	24 221	23 622	23 622	22 568	22 568
调整 <i>R</i> ²	0.225 624 8	0.227 483 9	0.751 2	0.751 3	0.752 1	0.752 1

2. 不同劳动收入份额指标

本文采用两种替代性指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进行重新衡量。首先,考虑到劳动收入份额(*LS*)取值在0,1之间可能带来计量偏误,借鉴李稻葵等的方式^[38],本文通过Logistic转换($\ln[LS/(1-LS)]$)得到指标*LS1*。其次,参考常进雄和王丹枫的度量方法^[39],将劳动收入份额定义为劳动者薪酬占劳动者薪酬与资本收入之比,其中劳动者薪酬以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衡量,资本收入为主营业务利润加固定资产折旧,计算得到指标*LS2*。表5列(1)~(4)回归结果表明,在1%显著性水平下,政府采购正向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5 更换度量方式

变量	(1)	(2)	(3)	(4)
	<i>LS1</i>	<i>LS1</i>	<i>LS2</i>	<i>LS2</i>
<i>CG1</i>	0.026 5*** (2.751 1)		0.025 6*** (3.081 6)	
<i>CG2</i>		0.004 9*** (3.607 2)		0.004 9*** (3.893 1)
控制变量/企业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i>N</i>	23 450	23 450	23 208	23 208
调整 <i>R</i> ²	0.761 7	0.761 8	0.795 4	0.795 5

3. 动态效应检验

表6结果显示,政府采购的滞后效应均不显著,说明不存在明显的预趋势,模型识别较为可靠。当

期效应同样不显著,而在采购后的第 1、2 期均呈现显著正向作用,此后效应逐渐减弱,表明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具有滞后性,而非即时发生。

表 6 动态效应检验

变量	(1)	(2)
	<i>LS</i>	<i>LS</i>
<i>L3_CG1</i>	0.015 2 (0.015 7)	
<i>L2_CG1</i>	0.013 7 (0.013 9)	
<i>L1_CG1</i>	0.010 4 (0.013 5)	
<i>CG1</i>	0.023 2 (0.015 5)	
<i>F1_CG1</i>	0.036 7* (0.019 3)	
<i>F2_CG1</i>	0.042 7** (0.018 9)	
<i>F3_CG1</i>	0.044 3 (0.028 3)	
<i>L3_CG2</i>		0.011 4 (0.013 8)
<i>L2_CG2</i>		0.0078 4 (0.011 8)
<i>L1_CG2</i>		0.001 02 (0.009 18)
<i>CG2</i>		0.001 51 (0.001 19)
<i>F1_CG2</i>		0.027 8** (0.013 6)
<i>F2_CG2</i>		0.038 6** (0.016 5)
<i>F3_CG2</i>		0.042 2 (0.027 0)
控制变量/企业年份固定	是	是
<i>N</i>	2 979	2 979
调整 <i>R</i> ²	0.044	0.043

4. 双重机器学习

为增强因果识别的稳健性,本文在删除主要变量的缺失值下采用双重机器学习(DML)方法对政府采购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效应进行再估计。表 7 结果显示,在随机森林的算法下,政府采购对

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向作用。

表 7 双重机器学习

变量	(1)	(2)
	随机森林	随机森林
CG1	0.034 5*** (4.344 1)	
CG2		0.004 7*** (5.838 2)
常数项	0.0036 (0.886 4)	0.003 5 (0.866 7)
控制变量	是	是
N	24 171	24 171

5. 其他稳健性检验

第一,为降低地区层面控制变量较少可能带来的偏误,本文在回归中加入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支出的对数值。第二,为检验序列相关性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将标准误聚类到行业层面和地区层面。第三,为考虑政府采购的滞后效应可能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结果,本文对政府采购变量进行一期滞后处理后再次进行回归。第四,通过加入新冠疫情的虚拟变量($Yiqi$)与政府采购的交互项来排除疫情对主回归结果的影响^①。结果显示,上述稳健性检验均支持前文基准回归结论,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四、作用机制

(一) 改善企业融资困境

企业融资约束会压缩用于支付流动性工资和福利的资金,从而降低劳动要素的收益分配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衡量融资约束的常用方法之一是基于综合指数的指数法。鉴于 KZ 含较多内生性变量且 SA 仅依赖规模与年龄可能与控制变量高度相关,本文采用 WW 指数作为融资约束度量。表 8 第(1)、(2)列数据显示,政府采购指标 CG1 与 CG2 的系数呈现负值,这证实政府采购对减轻企业融资约束具有显著效应,并促进劳动收入比例的提升。

(二) 保障企业经营持续性

政府作为可靠客户,具有强大的购买力,为企业提供广阔市场并降低违约风险。同时,付款能力强会减少企业收入不确定性。本文预期政府采购能够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并降低业绩波动。本文以员工人数的对数值($Capsize$)衡量生产规模($Product$),并借鉴 Bloom Nicholas 的做法^[40],以营业收入增长率的五年滚动标准差($t-2$ 至 $t+2$)衡量业绩波动($Risk$)。表 8 结果显示:在第(3)、(4)列中,政府采购指标系数显著正值,显示政府采购对提升企业生产规模具有显著影响。在第(5)及(6)列中,观察到采购指标系数显著呈负值,揭示政府采购对减少企业业绩波动起到了显著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政府采购活动

^① 限于篇幅,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展示,留存备案。

有助于扩大生产规模,平抑业绩波动,进而推动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上升。

表 8 融资困境与企业经营

变量	(1)	(2)	(3)	(4)	(5)	(6)
	<i>WW</i>	<i>WW</i>	<i>Product</i>	<i>Product</i>	<i>Risk</i>	<i>Risk</i>
<i>CG1</i>	-0.001 6*		0.016 0*		-0.077 3***	
	(-1.765 2)		(1.955 5)		(-3.336 2)	
<i>CG2</i>		-0.000 3**		0.003 9***		-0.010 4***
		(-2.464 7)		(2.956 2)		(-2.897 0)
控制变量/企业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i>N</i>	18 483	18 483	23 659	23 659	23 601	23 601
调整 <i>R</i> ²	0.836 0	0.836 0	0.962 0	0.962 1	0.681 1	0.681 1

(三) 调整人力资源结构

政府采购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和自主研发,高技能劳动与先进技术具有互补性^[41],因此在生产更新过程中对高技能劳动需求增加。本文借鉴赵烁等的做法^[42],以员工受教育程度衡量技能水平,并将员工分为研究生及以上、本科、专科和高中及以下四类。表 9 结果显示,政府采购变量 *CG1* 和 *CG2* 对研究生及以上和本科群体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对专科及高中以下群体不显著,说明政府采购显著推动了中标企业人力资本结构调整,尤其促进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员工的增加。

表 9 人资结构

变量	(1)	(2)	(3)	(4)	(5)	(6)	(7)	(8)
	研究生及以上	研究生及以上	本科	本科	专科	专科	高中以下	高中以下
<i>CG1</i>	26.211 5***		98.914 6*		49.456 2		17.892 0	
	(2.856 8)		(1.955 3)		(1.279 1)		(0.258 9)	
<i>CG2</i>		6.059 3***		19.798 1*		15.178 0*		5.896 1
		(3.605 0)		(1.6979)		(1.755 5)		(0.421 8)
控制变量/企业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i>N</i>	8 734	8 734	8 734	8 734	8 734	8 734	8 734	8 734
调整 <i>R</i> ²	0.962 4	0.962 7	0.962 1	0.962 2	0.960 9	0.961 0	0.939 6	0.939 6

五、异质性分析

(一) 宏观经济形势

当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生产经营风险增加,经理人会采取更保守的投资和雇佣策略,银行也会收缩贷款,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本文借鉴窦超等的做法^[43],以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衡量不确定性,并按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低不确定性组,采用费舍尔组间检验比较差异。表 10 结果显示,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越大时,政府采购对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更大。

表 10 宏观经济形势

变量	(1)	(2)	(3)	(4)
	低不确定性	高不确定性	低不确定性	高不确定性
CG1	-0.002 6 (-0.697 5)	0.009 8*** (3.869 8)		
CG2			0.000 0 (0.035 3)	0.001 8*** (5.062 1)
控制变量/企业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N	6 351	16 101	6 351	16 101
调整 R ²	0.775 3	0.732 5	0.775 3	0.732 6
组间差异系数	P=0.007		P=0.008	

注:异质性分析的系数组间差异检验的 P 值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抽样 1 000 次)计算得到(下同)。

(二) 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较弱的企业在政府采购中可能通过提升员工效率和增加劳动收入份额来激励劳动力,或借助额外资金流入提高工资待遇以吸引人才。基于此,本文采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衡量内部控制水平,按行业年度均值将样本分为强、弱两组。表 11 结果显示,政府采购变量 CG1 和 CG2 在弱内部控制组回归系数显著性大于另一组。费舍尔组间检验结果也表明差异显著。这说明政府采购在内部控制较弱企业对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作用更大。

表 11 内部控制

变量	(1)	(2)	(3)	(4)
	弱内部控制	强内部控制	弱内部控制	强内部控制
CG1	0.009 6** (2.383 7)	0.003 0 (1.338 6)		
CG2			0.001 6*** (2.870 1)	0.000 8** (2.373 4)
控制变量/企业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N	10 290	10 277	10 290	10 277
调整 R ²	0.652 0	0.834 7	0.652 1	0.834 8
组间系数差异	P=0.063		P=0.099	

(三) 企业 ESG 评级

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采购也可能激励企业改善 ESG 表现。为此,采用华政 ESG 评级衡量企业表现,并按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低两组。表 12 结果显示,在 ESG 评级较低的企业中,政府采购能够更有效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表 12 ESG 评级

变量	(1)	(2)	(3)	(4)
	ESG 评级低	ESG 评级高	ESG 评级低	ESG 评级高
CG1	0.009 6*** (3.332 3)	0.001 6 (0.579 1)		
CG2			0.001 5*** (3.406 7)	0.000 6 (1.408 0)
控制变量/企业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N	14 148	7 765	14 148	7 765
调整 R ²	0.712 1	0.825 8	0.712 1	0.825 9
组间系数差异	P=0.050		P=0.070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实现共同富裕既是解决社会根本问题、落实新发展理念和推动高质量增长的关键路径,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求。当前我国已进入消费主导阶段,扩大内需尤其是促进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政府采购作为需求侧的重要工具,逐渐受到学术界和政策部门关注。本文利用 2015—2022 年中国政府采购网与上市公司匹配的合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机制检验表明,政府采购通过缓解融资压力、保障经营持续性和优化人力结构,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高、内部控制弱及 ESG 评级低的企业中作用更为明显。

第一,提升政府采购制度设计水平,增进政策的靶向精准度与包容度。政府采购政策应当在达成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宏观目标背景下,更聚焦对弱势企业群体的精准支撑。具体而言,可建立多部门协同的企业风险—韧性评估档案库,由工信部门牵头,联合税务、社保、金融监管等部门,整合企业纳税记录、社保缴纳完整性、银行信贷违约历史、供应链稳定性等多维度数据,构建动态评估模型。该模型按行业、区域对企业抗风险能力进行分级标识,实现对融资约束大、现金流脆弱的企业的精准识别。在采购评标体系中,可试点将劳动收入份额稳定性与员工技能培训投入占比等社会绩效指标量化,并纳入评分细则,建议其综合权重不低于某比例,且在技术、价格等指标得分相近时作为优先中标依据。同时,优化资金拨付机制,推广分阶段支付模式并将支付效率纳入采购单位的年度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明确支付延迟的问责机制,从根本上防范款项拖欠。此外,可探索政府采购合同数据与中国人民银行供应链票据融资平台对接,允许中标企业凭政府采购订单产生的应收账款,以低于市场平均利率特定的基点成本向合作银行申请融资,并由财政设立专项风险补偿资金池,对融资坏账给予部分补偿,多措并举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保障劳动者收入稳定性。

第二,推动企业内部治理强化,利用政府采购制度的激励效果。政府采购不仅给企业带来外部市场契机,其规范的合同管理、质量要求及履约标准更能作为外部治理力量,倒逼企业内部管理升级。建议制定政府采购中标企业公司治理指引,应引导企业将政府采购中的合规性、透明度、社会责任等要求,转化为内部管理制度。在分配机制上,引导企业建立利润分享计划,明确约定将因政府采购订单产生的超额利润按不低于特定的比例,专项用于提高员工奖金、补充企业年金或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在绩效考核中,增设员工满意度、技能提升率、劳资纠纷发生率等指标,纳入管理层及部门的平衡计分卡,使

劳动报酬增长与生产效率提升真正同步。面对内部控制欠佳的企业,可将其参与政府采购的既往表现,把合同履约率、产品质量合格率、劳工纠纷诉讼记录等情况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并向社会公开,通过强化外部管控,倒逼企业改善内部审计流程、优化信息披露模式,逐渐造就优质订单—管理提升—收入增长—持续繁荣的良性循环。建议由第三方认证机构开展政府采购合规与社会责任绩效评级事宜,评级结果作为企业参与高价值采购项目的参考材料,进一步强化市场对企业改善治理的积极引导。

第三,打造差异化激励模式,助力可持续与责任导向的企业向前发展。建议按照企业 ESG 表现建立分层次、可预估的长效激励体系。一方面,针对 ESG 评级较低的企业,实施承诺制准入的改革举措。具体而言,在参与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等特定项目招投标时,应在投标文件当中公开承诺,于设定年内把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到行业平均水平,并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其承诺履行情况进行年度核查,若承诺未达成,暂停该企业参与同类项目资格 1 年。另一方面,对于表现优异的企业,建议给予信用券进行激励,将良好的 ESG 评级和劳动保障记录转化为企业投标时的信用加分,或在采购中获得优先权,获得实实在在的市场回馈。除此之外,可推出与共同富裕挂钩的债券,许可采购中标企业针对特定订单发行专项债券,债券利率与订单执行时劳动收入份额等社会效益指标的达成情况相挂钩,引导资本市场留意企业内部分配动态。

第四,建立全链条动态评估与反馈机制,确保政策效能持续优化。在“十五五”期间,应建立政府采购政策共同富裕效能年度评估报告制度。依托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平台、社保缴纳系统等,构建政策—企业—劳动者三维追踪数据库,动态监测中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员工薪酬增长率、社保缴纳率、员工流动率等核心指标的变化。该评估应分行业、分地区、分采购项目类型进行,并引入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政策净效应评估。评估结果应作为每年调整《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修订采购评分标准、优化激励政策的核心依据。若发现某类采购项目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不显著,则应适时调整其评分规则或退出采购目录;若某地区政策执行效果突出,则可总结其经验并向全国推广。此举可将宏观的共同富裕目标,分解为可测量、可考核的微观政策绩效,形成监测—评估—反馈—优化的闭环管理,确保政策的精准性与时代性,真正实现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

[参 考 文 献]

- [1] 施新政,高文静,陆瑶,等. 资本市场配置效率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股权分置改革的证据[J]. 经济研究,2019(12):21-37.
- [2] 周明鹏.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研究[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14-23.
- [3] 文丰安,杨婷.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内在关联、逻辑理路与理性审视[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5-16.
- [4] 王进文. 面向共同富裕的农民精神生活秩序建构:实践逻辑与路径选择[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6):81-94.
- [5] 胡凯,蔡红英,吴清. 中国的政府采购促进了技术创新吗? [J]. 财经研究,2013(9):134-144.
- [6] 张国胜,匡慧妹,刘政. 政府采购如何影响产能利用率? ——来自中国制造企业的经验发现[J]. 经济管理,2018(9):41-58.
- [7] 韩旭,武威. 政府采购能够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吗—基于精准扶贫视角[J]. 会计研究,2021(6):129-143.
- [8] 孙薇,叶初升. 政府采购何以牵动企业创新——兼论需求侧政策“拉力”与供给侧政策“推力”的协同[J]. 中国工业经济,2023(1):95-113.
- [9] 于小悦,马新啸,王竹泉,等. 政府采购对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J]. 财经研究,2024(3):111-128.
- [10] Rothwell, R. Technology-Based Small Firms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Potential: The Role of Public Procurement. Public

Policy, 1984(4): 307-332.

- [11] 贾根良. “中兴事件”对中国加入 WTO《政府采购协定》敲响了警钟[J]. 学习与探索, 2018(8): 113-121+194.
- [12] 李维安, 李勇建, 石丹. 供应链治理理论研究: 概念、内涵与规范性分析框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6(1): 4-15+42.
- [13] Dhaliwal D, Judd J S, Serfling M, et al. Customer Concentration Risk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6(1): 23-48.
- [14] 肖丁丁, 李晓钰, 朱桂龙. 政府采购影响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长效机制——中标情况的调节效应[J]. 软科学, 2023(7): 22-27+35.
- [15] Goldman J. Government as Customer of Last Resort: The Stabilizing Effects of Government Purchases on Firms.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20(2): 610-643.
- [16] 何小钢, 朱国悦, 冯大威.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23(4): 98-116.
- [17] 肖土盛, 孙瑞琦, 袁淳, 等. 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结构调整与劳动收入份额[J]. 管理世界, 2022(12): 220-237.
- [18] 钱雪松, 石鑫. 加强劳动保护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吗? ——基于《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季刊), 2024(1): 286-302.
- [19] 贾坤, 申广军. 企业风险与劳动收入份额: 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证据[J]. 经济研究, 2016(5): 116-129.
- [20] Kinyua K M, Changwony F K, & Campbell K. Government procurement contracts, external audit certification, and financing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24, 64, 1163-1231.
- [21] Gabriel R D. The credit channel of public procure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24, 147, Article 103601.
- [22] 罗长远, 陈琳. 融资约束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吗? ——基于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 金融研究, 2012(3): 29-42.
- [23] 汪伟, 郭新强, 艾春荣. 融资约束、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与中国低消费[J]. 经济研究, 2013(11): 100-113.
- [24] 江轩宇, 贾婧. 企业债券融资与劳动收入份额[J]. 财经研究, 2021(7): 139-153.
- [25] Fazekas M, Poltoratskaya V, Schiffbauer M T, et al. Procuring Low Growth: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Favoritism on Public Procurement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Bulgaria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1085). World Bank. 2025.
- [26] 武威. 政府采购“稳预期”政策的理论框架与经验证据——基于公共风险分析视角[J]. 财政研究, 2022(7): 66-80.
- [27] 倪晓然, 谭凯, 韩晗, 等. 低碳转型风险与劳动收入份额: 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J]. 经济学动态, 2025(6): 125-142.
- [28] 毛其淋, 王玥清. ESG 的就业效应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 经济研究, 2023(7): 86-103.
- [29] Cohen D, Li B. Customer-Base Concentration, Investment, and Profitability: The US Government as a Major Customer.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20(1): 101-131.
- [30] 余明桂, 王利璇, 赵文婷, 等. 专利质押、融资约束与企业劳动雇佣[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2(9): 70-93.
- [31] 李春波. 我国县区政府采购部门员工素质提升研究——以长春净月经济开发区政府采购中心为例[D]. 东北师范大学, 2011.
- [32] 姜晓文, 燕翔, 张人方. 集团共同审计能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吗? [J]. 审计研究, 2023(2): 112-123.
- [33] 李朝前, 沈悦, 姚树洁, 等. 金融地理可及性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融资成本与人力资本结构视角[J]. 金融研究, 2023(9): 150-167.
- [34] 白重恩, 钱震杰, 武康平. 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J]. 经济研究, 2008(8): 16-28.
- [35] 王雄元, 黄玉菁. 外商直接投资与上市公司职工劳动收入份额: 趁火打劫抑或锦上添花[J]. 中国工业经济, 2017(4): 135-154.
- [36] 姜爱华, 费堃桀. 政府采购、高管政府任职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J]. 会计研究, 2021(9): 150-159.
- [37] 方军雄. 劳动收入比重, 真的一致下降吗?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发现[J]. 管理世界, 2011(7): 31-41+188.
- [38] 李稻葵, 刘霖林, 王红领. GDP 中劳动份额演变的 U 型规律[J]. 经济研究, 2009(1): 70-82.
- [39] 常进雄, 王丹枫. 初次分配中的劳动份额: 变化趋势与要素贡献[J]. 统计研究, 2011(5): 58-64.
- [40] Bloom, Nicholas, et al. “Uncertainty and Investment Dynam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 3, 2007, pp. 1057-1108.
- [41] 刘啟仁, 赵灿. 税收政策激励与企业人力资本升级[J]. 经济研究, 2020(4): 70-85.

[42] 赵烁, 施新政, 陆瑶, 等. 兼并收购可以促进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吗? [J]. 金融研究, 2020(10): 150–169.

[43] 窦超, 袁满, 陈晓. 政府背景大客户与审计费用——基于供应链风险传递视角[J]. 会计研究, 2020(3): 164–178.

The Way to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nd Enterprise Labor Income Share

Li Zengfu Lei Yan

(College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000, China)

Abstract: Increasing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in enterprises is an important pathway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and enhance public well-be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labor income share is not only determined by internal profit distribution decisions and the structure of factor markets within enterprises but also is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the macro-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division of capital and labor income is affected not only b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 degree of capital substitution but also by constraints, such as corporate financing conditions, operational stability, and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n this particular context,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s a key fiscal expenditure tool, may alter the pattern of labor income distribution in enterprises by improving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enhancing ope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guiding changes in employment structure.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selects Chines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5 to 2022 as the sample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on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enterprise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study finds that government procurement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enterprises. Mechanism tests indicate that government procurement primarily exerts its effects through three channels: first, alleviating financing difficulties, a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contracts serve as a "credit label" to enhance corporate credit; second, maintaining operational continuity, as stabl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demand can reduce the risk of performance fluctuations; third, promoting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since the high requirements of procurement projects drive enterprises to invest more in skilled labor.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in regions with higher economic uncertainty, for enterprises with weaker internal controls, or for those with lower ESG rating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is more pronounced. This research expands the boundaries of the study on the mi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revealing a new mechanism by which government procurement boosts the labor income share and optimizes internal income distribution within enterprises. It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olicy guidance for realizing the goals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design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system should be further optimized, with increased "targeted support" to guide enterprises to adjust their compensation distribution systems, achiev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social equity.

Keyword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abor income distribution; financing difficulties; operational stability;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责任编辑: 马文斌]